

# 李先念和陈锡联 同一个村走出的两个副总理

湖北红安一个县出了200多名将军,被称为将军县。其实,红安除了将军外,还出了不少部长,甚至副总理、国家主席。其中最著名的,便是叱咤中国政坛几十年的李先念和陈锡联了。但很少人知道,这两人不仅是出自同一个镇——高桥镇,还出自同一个村——长丰村。

## 解放前,两人曾并肩作战

李先念和陈锡联两家相距很近,不过二里地远,中间只隔一道小山梁。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,前夫去世后,才嫁于李家。因为这一层关系,两人还是远房亲戚。

陈锡联是在李先念带领下走向革命的。

1927年11月,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黄麻暴动,但由于敌人的镇压,最后失败了。随后,长丰村也成为了反动派重点镇压的“赤色村”。陈锡联的一个族叔,叫陈芝斌,是当地一个恶霸,专与地下党作对,充当“反攻清算”的急先锋。李先念等人决定杀了他,震慑反动势力。

一个深夜,李先念带着三个党员悄悄地来到了陈锡联家,要他带路去炸开陈芝斌家的大门。

陈锡联光着脚,带着他们来到族叔家,叫开大门后,李先念等人一拥而上,一把干掉了陈芝斌。

陈芝斌被杀掉,这事威震四方。

此时,陈锡联才13岁。直到第二年,他才参加红军。

5年后,陈锡联在部队中当上了团政委,李先念则是军政委。在红30军中,每在关键时刻,李先念就让陈锡联这个团上。陈锡联冲锋在前,敢打硬仗、恶仗、险仗,成为李先念手下的一只铁拳。李先念多次对人说:“陈锡联打仗数第一。”

陈锡联则说:“先念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。”

两人一起战斗,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分手,去了不同的部队。

李先念在抗战中率领新四军在大别山一带活动。一次,他发现陈锡联家空无一人,一问才知陈母在外流浪乞讨,立即派侦察员找到她,并送去30块银元。

在解放战争中,陈锡联随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与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会合了。两人一起参加了歼灭黄维集团的作战,战功赫赫。全歼黄维兵团后,邓小平决定让陈锡联和李先念一起做搭档,以司令员、政委统军第三兵

团。但是,李先念希望去做地方工作,两人终于没能在一起,只有陈锡联当了第三兵团司令员。

## 解放后,两人都当上副总理

新中国成立后,陈锡联一直在军队工作,李先念则在湖北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。在土改运动中,地富坏分子被打倒了。陈母热心肠,有人登门请她打招呼去求情,她不懂政策,有求必应,帮错人。李先念的姐姐也是这样。李先念知道后,立即把两人一起接到自己家里,让她们住着。一次,李先念去北京开会,见到陈锡联开玩笑说:“把她们弄到家里,每日盯着。看她们还敢瞎管闲事不!”

1954年,李先念从湖北调到北京,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。陈锡联则是解放军炮兵司令员,也在北京。两人相互走动,经常见面、叙谈,亲如兄弟。

1959年,陈锡联离京,调往沈阳,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。这是一个要职。

1969年,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,陈

锡联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。早在13年前,李先念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,此后一直连任,这次在九大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一村出了两个政治局委员,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件罕见的事情。

然而,奇迹还在创造。

1975年1月,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选举新一届国务院领导人,一共选举了12名副总理。其中,李先念排第三,陈锡联排第四。两人本来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,现在又同为国务院副总理。

这还不是陈锡联和李先念政治生涯的巅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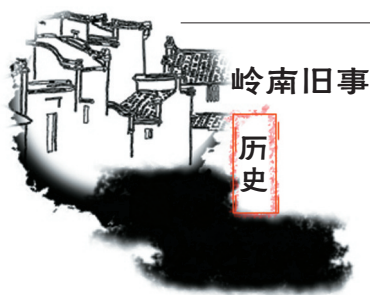
陈锡联政治生涯的巅峰,是1976年2月,由于毛泽东决定,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,但为时不长。

李先念的政治生涯巅峰更高,1983年6月,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,成为继毛泽东、刘少奇之后第三任国家主席。时年他74岁。

(作者:陈冠任,来源:一点资讯)



■为毛主席纪念馆基石培土,左三为李先念,右三为陈锡联 资料配图



## 岭南旧事

历史

### 荔枝湾是最佳赏月处

百年前的广州,最好的赏月之所在是荔枝湾。中秋夜的荔枝湾,紫洞艇的租金比平时起码要贵十倍,但仍然十分走俏。几乎每一艘船都挂着“雕玉镂冰、玲珑剔透”的素馨花灯,空气中暗香浮动,调皮的孩子们则个个提着柚子灯,洒落一地的欢声笑语。这素馨灯与柚子灯交相辉映的,



■上世纪30年代的荔枝湾

## 百年前在广州这样过中秋

是老广州中秋节最有雅趣的回忆。

在八九十年前的广州城里,虽然没有“小长假”一说,但中秋节可是不折不扣过足三天的。八月十四,大家忙着准备过节的菜品,晚间小酌一顿,是为“迎月”;八月十五,合家吃过团圆饭,将楼顶天台打扫干净,在桌上摆上月饼、芋头、田螺、瓜果等应节食物,欢欢喜喜,一起赏月;到了八月十六,一家人还要相约在天台上再吃一顿,顺便赏一赏十六的月亮,美其名曰“追月”,因为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。而城内一些有名的茶楼,还会举办追月茶会揽客。毋庸讳言,除了赏月之外,

“吃”是中秋节最大的主题,有钱人家要摆出精致的宴席,穷门小户也会力求丰富,故而老广州有句俗语:“夏唔饱,冬唔饱,八月十五食餐饱。”

当年的中秋宴席,很少有人到外面下馆子。不过,幸而老广州商业发达,手头宽松的人家,若是不想受累,大可以请个厨师上门,或者直接叫外卖。当时,打铜街的“冠珍”,上下九的“荣珍”,杉木栏的“八珍”、“新瑞和”都是主营外卖的知名餐馆,他们经营的外卖全是成套的酒席。厨师把菜做好后,一道道装进锡簋。随后,小伙计把锡簋放进木托盘,二三十斤的分量往头上一顶,就去送餐了。中秋之夜,街头巷尾尽是头顶托盘、健步如飞的小伙计,成了一道特别的节日风景。

### 广式月饼成为家宴主角

把时光倒推得更远一点,所谓月饼,不过是像满月一样的大面饼。清代大儒屈大均写的《广东新语》提起“月饼”,也只有寥寥5个字:“为大饼像月”。而与屈老夫子同时代的《地

方志》,提起过中秋,说的都是“剥芋食螺”,寓意多子多福,“月饼”二字,要么不提,要么一笔带过,可见这个大面饼远非中秋家宴的主角。

月饼如何从“满月一样的大面饼”一跃成为中秋节的主角?这与广州中西文化的交汇及激烈的商业竞争息息相关。19世纪60年代,洋人聚居胡沙面出现西式糕饼店,接着,沙面附近的西关富人聚集区,本地人开设的糕饼店受其影响,研发出越来越多“融合中西”的美点,广式月饼就是其中之一。由此,月饼风头渐渐盖过芋头和田螺。

七八十年前,月饼一跃成为中秋家宴的主角,但穷人和富人的吃法大不相同。豪华版“陶陶居上月”,用镂花的酸枝木雕包装,售价数十银元,照样有人趋之若鹜;而普通的市井平民,因为担心一时拿不出钱来,不得不加入由糕点商发起的“月饼会”的组织,每月“供”个几角银币,以便在八月初一领到一份月饼。月饼也要分期付款买,想来还真让人有些心酸。(来源:岭南文化微信公众号)